

文化东莞

专项资金资助出版

文艺类丛书

内部的风景

「文学评论集」

曾海津◎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内部的风景

曾海津◎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内部的风景 / 曾海津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3

(“文化东莞”专项资金资助出版文艺类丛书)

ISBN 978-7-5360-7408-8

I. ①内… II. ①曾…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8825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张 懿 李珊珊 张 旬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刘红刚

书 名 内部的风景

NEIBU DE FENGJI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0.875

字 数 235,000字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文化东莞专项资金资助出版文艺类丛书（2013 年）》

编 委 会

主 任：潘新潮

副主任：叶泽驹 刘锦明

委 员：曹永阳 林玉秀

张淑玲 曾小春

柳冬妩 朱莲红

东莞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总序)

潘新潮

这套《文化东莞专项资金资助出版文艺类丛书(2013年)》的出版,可以说是近年来东莞文学创作优秀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为深入贯彻落实《东莞市建设文化名城规划纲要(2011—2020年)》和《东莞市建设岭南文化精品名城实施意见(2011—2020年)》,根据《东莞市文化精品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2012年底我市开展了东莞市文化精品专项资金申报评审工作。经评审公示,我市共有九部文学艺术作品入选首批出版补贴类项目,当中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戏剧作品集、文学评论集、纪实文学、版画作品集。

东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精彩而生动的缩影”,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东莞文化名城建设的推进,东莞的文学艺术创作与之呼应,东莞作家、艺术家出现了群体性崛起。“东莞作家群”中有中国作协会员二十余人,省作协会员近百人,他们写出了一大批浓厚凝重、意蕴深远的精品佳作,在当代中国文坛筑起了一道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景线。

2013年，东莞作家荣获了“三个一百”国家原创图书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台湾第四届桐花文学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广东省“九江龙”散文奖、2013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等众多奖项，东莞文学作品还频频登上2013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2013年中国报告文学排行榜、2013年中国散文排行榜、2013年中国随笔排行榜等。东莞文学作品如此密集地获奖和荣登各类文学排行榜，在此以前从未出现过。在旗帜林立的当代文坛，“文学莞军”成为一支不打旗帜的文学劲旅，成为中国文坛上一支令人瞩目的生力军。文学是历史发展的语言镜像，也是现实真实的心灵回声。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触摸历史，触摸时代，触摸这里的山川河流、人文气息。

“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希望东莞的作家、艺术家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创作出更多优秀文学艺术作品，抒写东莞情，传递正能量，激励人们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奋斗。

（作者系中共东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序

见异，唯知音耳

——读文学评论集《内部的风景》

李逸津

我与曾海津本不相识。大约两三年前，我在网上搜寻有关我的故乡——广东东莞东坑塔岗村的资料，发现一篇描写塔岗风物的博文《塔岗四记》，文章考据翔实、语言优美，作者曾海津，估计是当地的文艺工作者，便立即加为博友。今年初，我博客上的一篇《亲历广东民间婚礼》，被海津点击转载，还加了评论，这样我俩就有了网上的交谈。网聊中得知他在东坑镇打工和生活，发表过各类文学作品，已经出版多部文学评论集、诗集和报告文学集等，当时脑海中闪过的就是四个字——后生可畏。海津还诚恳地提出请我为他的文学评论集《内部的风景》作序，这可实在是令我不仅感到为难，而且有些诚惶诚恐了。因为说来惭愧，虽然本人头上有几道在外人看来还算耀眼的光环，诸如大学教授、省级协会理事、海归学者等，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究竟“我才之多少”自己心里最明白，起码没资格在像海津这样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面前指手画脚、信口雌黄。今年清明，我回塔岗祭祖探亲，这才与曾海津有了面对面的交谈。见面后最使我震惊的，还不仅是有如此丰硕的创

作与评论成果的曾海津，竟是个尚未出而立之年的年轻人，更在于他的学历仅仅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我不禁想起了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一句话：“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以海津的才华与灵气，假如他自幼生长在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能进入北大、复旦、南开这样的名校学习，再得名师指点与提携，现在也许已经是海内外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了。我如此说，绝无假惺惺廉价同情，平添海津胸中郁闷之意。事实上，以他现在的实力，足以在众多拥有各种显赫头衔的专家学者面前昂首自立，无愧于人！子曰：“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海津说他很想在文脉绵长的我的故乡定居，使我感到欣慰。我相信，千里马早晚会被伯乐相中，有才华的人终究会脱颖而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期盼他会有更大的作为。想到此，虽然我自问才学识见均不足以为海津的书作序，但作为一个同样出身于草根平民的文学爱好者，作为一个同样有过小人物奋斗经历的年长者，作为一个也曾辅导过众多高等自考学子，亲眼目睹他们中许多人自学成才、终成大器的老教师，我有责任为海津这样的青年才俊鼓劲，为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喝彩。想到此，我只能勉为其难写此书序，但愿即便不能为海津的著作增光，也不致使其蒙尘。

海津的这本文学评论集《内部的风景》，辑录了他在国内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过的作品评论和理论文章23篇，20多万字。议论所及，大多为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各领风骚的先锋派作家，以及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广东作家的作品。这对于像我这样长期埋头于古典，且生活在北方的人来说，颇有难以置喙之感。故这里只能以一个雾里看花、隔帘观影的外行人身份，对海津大作发表一点朦胧

的印象和读后感。

曾海津文学评论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体现了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的勇气。这不仅在于他所评论的对象，多为当代文坛上有争议的作品，更表现在他对这些作品的评论，敢于突破传统主流文学评论的思维定势与评价尺度，大胆提出自己对作品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的独特分析、评价与判断。比如，贾平凹的《废都》是一部曾经在当代文坛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的争议性作品，许多读者乃至文化官员看到的都是其中的“性”，于是从卑劣阴暗的心态出发，用其满足个人意淫欲望的有之；以道德卫士的面目出现，对其大加挞伐的有之；但无论或褒或贬，都没有对作品的真实意蕴做出正确的解读。记得笔者当时正在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东方系的一位资深汉学家谢列勃里亚科夫教授就对《废都》有过好评，说它的意蕴很深刻。而现在曾海津在《城乡忧思与阉割美学》一文中把贾平凹的《废都》与《秦腔》放到一起考察，指出它们是“贾平凹创作历程中彼此辉映的两面镜子：一面照着一座衰败的城市，一面照着一个颓靡的乡村”。这就一下子穿透了作品表层“性描写”的迷障，而深入到作品深层结构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文化意蕴。海津写道：“《废都》里的欲望意味着阉割，这是城市的精神状况；而《秦腔》里的阉割则掩饰着欲望，这是农村的精神状况。可以说，二者共同图绘出了一幅迷失在失落中的时代图景。”我认为这一解析是十分深刻的，也是十分大胆的。它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在历史急剧前进的改革时代，普通中国人、中国社会普遍感受到的心理彷徨、浮躁，以及传统失落的迷惘状态。这里没有媚上，没有谀世，没有言不由衷的官话、套话。人们也许会指责，“失落

中的时代”这一说法有失偏颇，没有通观全局、高瞻远瞩、鼓舞人民信心的“正能量”；但我认为他说的是实话，是真实地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真实感受。我们能指责一个说真话、说实话的人吗？

诚然，曾海津所说的“失落”，是以乡村生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正如他评论贾平凹这两篇小说所说：“贾平凹的乡土小说，透露了时代的怀旧情结。贾平凹农民和文化人的双重身份，使他总是善于把乡村的凋敝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联系起来，他的乡土小说具有浓郁的怀乡情绪与对中国文化再生的探索的双重特点。”中国当下举国投入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要告别那种中国人背负了几千年的传统。但如果“现代化”真的把这些传统扫荡无遗，恐怕又绝非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所能承受，而且事实上也绝非了无遗憾、百分之百正确的选择。我的长兄李逸江当年写的获奖小说《尘封的老屋》，表现的正是这种当“历史以一时难测的高速冲向前方”时，许多人心中都有的迷惘与惆怅。这种情绪不是单纯地怀旧，单纯地反抗历史进步。它是含泪的微笑，是诀别过去而又依依不舍的苦涩。它提醒我们注意，在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大潮中，要体察人性与人情的微妙波澜，要兼顾对传统的承接和保存，要注意物质生活改善与人文精神提升的有机协调。一句话，要守住我们民族几千年赖以维系和延续的精神家园，守住我们民族精神的根脉和底线！文学家与政治家的不同之处即在于，政治家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目标，必须大张旗鼓地为自己的路线方针造势，必须理直气壮地宣示自己政治策略的正确，以争取群众，获得支持。文学家的任务则是始终把目光聚焦在历史大背景下的人性、人心和人

情，要体察时代大潮中每一个活人细微的心理脉动，写出人物的真情实感、普通人生活的原汁原味。而人类之所以在史书、政论之外，还需要文学者，就是要通过对生活原貌的反映和描写，品味人生滋味，反思历史进程。也正因为如此，优秀的文学家往往能与伟大的政治家、历史学家一样名垂青史，他们的作品也能成为时代的镜子与丰碑，成为人类生活的教科书。贾平凹的上述两部小说，其意义与价值即在于此；而曾海津的评论能对其做出深入阐释与肯定性评价，其贡献也同样在于此。

海津文学批评所表现出的敢于直面现实、直斥生活弊端的勇气，还表现在他对莫言作品的评论上。在《从〈红高粱〉到〈生死疲劳〉》一文中，海津分析了莫言这两部作品所表现的精神气质的变化。他指出：“《红高粱》描述的生机勃勃的生命能量，既是一种理想化的民族精神，又隐喻着 80 年代文人的‘气壮山河’之气魄。”而“《生死疲劳》诞生的 21 世纪初，则已经与 80 年代的历史语境发生了深刻的断裂。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国家财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严重的现实与精神危机。官员腐败、贫富分化、金钱万能、人文精神的边缘化……这些沉重的现实压抑着知识分子飞向天空的翅膀，逼迫他们直面现实、关注现实、批判现实。《生死疲劳》正是这种新的历史语境下的产物。”这话说得何等直白、何等犀利，又何等一吐胸中块垒之爽啊！但曾海津还不止于此，他又进一步对莫言创作的这种变化做出冷静的分析，他指出：“莫言从‘精神家园’到‘现实家园’的转变绝不是一种‘下降’或‘倒退’，而是他始终保持人文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例证。如果说，在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歌唱理想无可厚非，那么，在

理想被击碎的时代正视现实，则是莫言为我们提供的最好启示。”他的这一评论，我认为是符合莫言作品实际，也是符合当前社会实际的。当年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历数往代各朝文学，均有褒有贬，唯独对本朝南齐只赞不评，这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定式。曾海津能对当今时代做出这样的评判，是他坚持一个正直的文学批评家操守的表现，也是当今社会为作家、评论家提供了宽松的思想环境的表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有莫言这样的作品问世，有曾海津这样的评论发表，同样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学有希望、有前途的证明！

曾海津文学评论的第二个特点，是他表现出了一个文学批评家同时又是思想家和政治评论家的思想深度与锐度。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能动反映，评论文学作品必然要涉及对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批评，因此，文学批评往往具有社会批评的性质。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历史剧《济金根》的评论，恩格斯对哈克奈斯《城市姑娘》的评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家杜勃罗留波夫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大雷雨》的评论，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论，都不仅仅是文学批评，而同时具有社会批评、政治批评的性质，在社会思想史上也是重要的参考文献。我在读海津的《〈白鹿原〉的一种解读》时，就深深感到了文中对社会历史现象透辟分析的力度所带来的震撼。曾海津写道：“让一切回到了毛茸茸的‘原真’状态，用‘人性’解剖‘民族秘史’，这又是作家陈忠实重构叙述的一个重要支点。在争斗中，心理诉求成为一个重要甚至根本因素后，最终归回到人性的深处便是顺势之举。也或许，革命本身就是人性原初的欲望。”他说：“正是这种个人争斗，让一切以革命

名义攫取私人利益的行为变得如此‘残酷’……这种‘残酷’让人胆战心寒。”曾海津最后指出：“这些‘残忍’和‘荒谬’呈现出了血淋淋的个人争斗，策略性地消解了革命神圣的外衣，最终暴露出宗法制下的以小生产者为基础力量的革命的历史局限性。它既令人们思索历史的教训，又逼视人们正视自己的内心。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变迁与停滞背后的人性根源，看到人心里那一丝丝最隐秘最根本的渴求，正是这些最细小最直白最难以言明的心态，造就了一个乡村乃至一个文明的命运。”笔者早年曾参加过革命烈士传记《柳直荀》（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写作，采访过一些当年在湖南农运和洪湖苏区与柳直荀烈士并肩战斗过的老同志，听他们讲述过许多当年苏区“肃反”的残酷故事。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那些悲惨的往事不能在传记中过多记述，只能深藏在个人记忆中。不久前，我因参与一项教育部科研项目，撰写了《冯骥才在俄罗斯》一文，发表在《中国艺术报》2012年8月10日第3版上。文章主要介绍的是俄罗斯学者对冯骥才“文革”题材作品的研究。冯骥才作品对“文革”悲剧的深刻揭露与反思，同样涉及到深刻的人性问题。时至今日，可以说没有一次彻底的人道主义洗礼，没有一次全民族深刻的道德反省与精神忏悔，这样的历史悲剧还会重演。前不久各地发生的以“抵制日货”为号召的“爱国”狂潮中同胞相残的暴行，不就已经明白昭示了这一点吗？所以我说，陈忠实《白鹿原》的意蕴是深刻的，曾海津在评论中挖掘和指明的这一点也同样是深刻的，是极具警醒意义的。

曾海津评论的第三个特点，是对来自生活底层的“乡土作家”或云“草根文人”的理解与支持。大约是自己的出身、经历以及年

龄接近的缘故，海津对乡土作家充满了尊重与热爱，在品评他们作品的时候，绝无颐指气使、居高临下的傲视，而更多表现出的是态度上的爱护、情感上的共鸣、心灵上的沟通，以及艺术上的知音与包容。

说实在话，我们这些年见到的“乡土题材”作品，其实并不算少。起码每年“春晚”必不可少的小品，总要有两三个农村题材的段子。但这些作品或是极力把农村生活诗意化、浪漫化，来寄托或抒发作者乌托邦式的所谓“乡情”；或是从悲天悯人的旁观者角度，对农民的艰辛与不幸发一点不疼不痒的感慨与同情；更有甚者，则是用愚蠢、丑陋、猥琐的农民形象，以及他们小人乍富的轻狂、附庸风雅的无知，来满足城里人的心理优越感，使其感到“突然荣耀”而造成喜剧效果。正如曾海津在评论云南诗人雷平阳的《乡域中的苦难之歌》一文中所说：“相比之于雷平阳的乡村，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面，真实的村庄太少了，而视它们为乌托邦、世外桃源的文字又太多。现实的村庄常常被理想化或者说被遮蔽。”曾海津指出，雷平阳诗歌的优点就在于他笔下的村庄“还原了乡土本身的面貌，使我们找到了久违的乡土气息。雷平阳熟悉这些人的生活，就像熟悉自己的掌纹一样……他笔下的村庄没有刻意的光环，而拥有一份撼动人心的真实，因而就少了那些近年来一些散文和诗歌固有的牵强和作秀以及矫揉造作的悲悯和呐喊。”我认为，这一评价是符合雷平阳作品的实际，也体现了曾海津文学评论敢说真话的特点的。

曾海津指出，雷平阳创作之所以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就在于他的真诚，他反映生活的真实。他写道，雷平阳“诗歌的力量不

来源于对现实的脱离而是根植于现实的核心。正是因为生活在这样一个群体中以及他本身的赤子和悯怀之心，使他的作品多了许多生活的实录。”海津引述了雷平阳在2007年4月7日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问时说的两段话：“从他们（农民工——笔者注）身上，我看见了劳动的卑贱和耻辱，而不是高贵与伟大。他们那发狠的劳作，几乎是在与自己的生命抬杠，可他们真的没体会到劳作所带来高贵与伟大。他们一再地向人民币敬礼、献媚，但人民币到了他们那儿，总接近零，有时比零还少……”“这不是刻意或带着某种使命的写作，它就是我的生活本身。像任何一个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的人一样，我也希望这种生活尽快结束，代之以阳光、幸福和美。显而易见，这是我的奢望。”读着雷平阳这些话，笔者心中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雷平阳是真诚的和大胆的，曾海津引用他的话，同样也是真诚的和大胆的，他是雷平阳的知音！但批评家的任务绝不仅仅是摘引作者的言论，绝不止于像剧场看客那样的欢呼、叫好，而是必须进一步分析和指出造成这种创作冲动的现实原因，指出作家创作灵感产生的根源。曾海津做到了这一点。他指出：“通过雷平阳的诗歌和散文，我们看到的是，乡村社会部分或者全面地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通过产业的转移和新的产业发展，开拓新的发展空间的机会对于大多数农村特别是昭通农村来说是那样渺茫，这样的进程对于他们来说甚至是被动地接受，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农村不过是变为一个劳动力的集聚和供给的场所，变成了当下的‘中国制造’，乡村原有功能和发展已转向新的方向，但是旧有的农村情况和新的道路的不明确使农村前进的道路走得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雷平阳写出了想挣脱又挣脱不了那片土壤

以及根本无力挣脱的人物的人生苦难。”而如何给雷平阳笔下的农村和农民新的希望，帮助他们摆脱人生困境，这不仅是文学家要为之探索和大声疾呼的时代课题，更是政治家们必须下大力解决的现实社会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雷平阳的创作以及曾海津的评论，都超出了文学的阈限，而具有了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变革的政治意义。

曾海津关注底层作家的另一个重点是“打工文学”。广东当年作为引领风气之先的改革开放桥头堡，曾经把“外来妹”“打工仔”这样一些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词汇带入现代汉语的词语库。家兄李逸江早在1987年就写过一篇题为《Nan妹在东莞》的报告文学，发表在该年第8期《黄金时代》杂志上。据说“Nan妹”一词也就是由于这篇文章而传播到全国。但家兄的报告文学，由于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且是发表在官方刊物上，要服从当时舆论宣传的需要，正面歌颂占了主导地位。而到了改革开放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的今天，改革道路上的正负面效应都已充分经历和暴露，再做一味乐观的正面歌颂，恐怕就有违时代和民心的需要了。所以，被曾海津评论的郑小琼、柳冬妩这两位“打工诗人”，他们的作品就不再有如家兄李逸江写打工妹时的那种热情洋溢，而是“再现了后工业时代原生态的底层生活画面，呈现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进城的艰辛历程”。（《郑小琼与黄麻岭及其打工诗歌》）曾海津指出，郑小琼的打工诗歌“具有一种深刻的洞见，并蕴含着疼痛”。而“这种疼痛感正是当代诗歌中所缺乏的”。他说：“郑小琼所描绘的疼痛，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民的痛苦的写照，这种疼痛带有强烈的时代特性，并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他写道：“柳冬妩

以其真诚的心灵，抒写着打工人生的篇章，用心去感受打工生活的艰辛，用客观、独立的心态去面对所面临的一切困难，……展现他对世俗的反思与反抗。”（《柳冬妩的打工诗歌》）这里，曾海津又一次表现出了他敢于肯定直面生活的作品，敢于肯定和张扬诗人、作家的批判精神的勇气。同时，曾海津对打工诗人的理解与支持又并未停止在肯定和赞扬上，他进一步为打工诗人指出了前进和发展的方向，他写道：“虽然打工诗歌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然而其生存的环境与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仍旧处于一种萌芽状态，打工诗歌的创作要放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大背景上去考虑，与时代相结合，才能够有大作为，最为重要的是打工诗人应该拓展自己的精神，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放眼整个世界的嘈杂与混沌，提炼出生活的精髓作为百姓的精神食粮，才能显现出打工诗人与打工诗歌在这个时代存在的价值。”（《柳冬妩的打工诗歌》）他的这一评论是中肯的，也是充分体现了他对打工诗人的理解、支持与爱护、期望的。

19世纪法国印象主义文学批评家法郎士曾经把文学批评称为“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中国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引屈原的话“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然后指出，“见异，唯知音耳”。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有批评家对作品内涵的独特发现，应能给读者以至作者以新鲜的启迪，应能帮助他们发现作品中潜藏的，甚至连作者自己也曾意识到的深刻意蕴，从而更好地指导阅读、促进创作。我想，海津把自己的文学评论集命名为《内部的风景》，恐怕就蕴含有这样的意义吧？我不敢说海津的文学批评已经完全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但起码他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且取得了眼前有目共睹的可喜实绩。这是他今后取得更大成绩的起